

中觀哲學

〔印穆帝著
郭忠生譯〕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中觀哲學

[印] 穆帝
郭忠生 譯著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中觀哲學 / (印) 穆帝著 ; 郭忠生譯. — 貴陽 :
貴州大學出版社, 2013.10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ISBN 978-7-81126-620-7

I . ①中… II . ①穆… ②郭… III . ①中觀派—佛教
哲學—研究 IV . ①B946.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 (2013) 第 237480 號

中觀哲學

著 者: [印] 穆帝

譯 者: 郭忠生

責任編輯: 但明天

出版發行: 貴州大學出版社

印 刷: 貴陽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張: 13.75

字 數: 322 千

版 次: 2013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81126-620-7

定 價: 85.00 元

版權所有 違權必究

本書若出現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出版社聯繫調換

電話: 0851-5981027

本書入選“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本書為 2013 年貴州省新聞出版局重點圖書，
並獲貴州省出版發展專項資金資助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學術委員會

- 方立天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樓宇烈 教授(北京大學)
黃心川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楊曾文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張風雷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宣 方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李四龍 教授(北京大學)
龔 雋 教授(中山大學)
馮煥珍 教授(中山大學)
洪修平 教授(南京大學)
徐文明 教授(北京師範大學)
王雷泉 教授(復旦大學)
陳士強 教授(復旦大學)
麻天祥 教授(武漢大學)
藍吉富 教授(中國臺灣)
林鎮國 教授(中國臺灣)
宋立道 研究員(中佛協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出版前言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屬於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立項的“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第一期工程已經得到貴州省新聞出版局的出版基金資助。這個《文庫》的總編纂指導者是國內著名佛教學專家。參與編纂工作的有老中青三代學人。中青年學者們都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多年中成長起來的佛教學才俊。老一輩的學者有中國人民大學的方立天教授、北京大學的樓宇烈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名譽學部委員黃心川教授和楊曾文教授等。承擔《文庫》出版任務的是我們貴州大學出版社。本出版計畫分為三期工程進行，計畫搜羅或再版國際佛教學研究界的最重要作品，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國（含臺灣地區）、日本和歐美的佛教學研究界在過去二百年中的標杆性作品。

本《文庫》為開放性的出版項目，其最終出版的規模大小，取決於所涉及作品的版權的解決，更取決於貴州大學出版社的經濟實力，也取決於參與本《文庫》從推薦書目到編纂出版的合作者的努力。本社之所以不自量力，承擔了這麼一個耗資大、耗時長而費力甚艱的文化工程，所企望者，是為國內的佛教學研究界提供一批便於利用的經典之作，為中國的文化建設與文化繁榮盡一個出版者的綿薄之力，當然，也還有巡禮過去二百年來世界佛教學研究中輝煌成果的用意。我們相信，佛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精神財

富之一。佛教學研究是全人類共同的宗教學術探索的精神活動，它也是東西方人文學者的精神創造力的結晶。

佛教原本是東方思想寶庫當中的最重要的一份財富。兩千多年前，佛教在印度誕生。從那裏向四面八方傳播，在南方形成了巴利語佛教；經西北方的中亞向遠東傳播，形成了漢語系的佛教。佛教思想在漢、韓、日的民族文化當中生根發芽，開出了朵朵奇葩；佛教也在“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尋到了自己的家園，孕育出神奇瑰麗的藏語系佛教文化。對於西藏佛教的關注，從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已經成為世界宗教文化研究的熱點。這三大語系的佛教，又稱為南傳佛教、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其中南傳佛教，因為其教理教義上距佛陀本人生活佈道的時期最近，往往被認為深得原始佛教的真義，是初期佛教部派時期的上座長老們的傳統，故也稱上座部佛教。北傳佛教的經典語言是中古以來的漢語，故也稱漢傳佛教。漢語系的經典，從西元之初以降，及至近代，一直使用漢文書寫流傳於世。佛陀的言教，雖然譯自當時的梵語或中亞地方語言，但一經寫為漢文佛典，也在古代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通行無阻。藏傳佛教的經典形成於十世紀以後，書寫系統和宗教內涵都深受印度思想文化的浸淫。

從空間位置上看，誕生於古代印度的佛教，雖然向四方傳播，但其最顯著的成果則祇在東土和南方顯現。在世界史上的西元之初，佛教並未涉足北方的西伯利亞草原，當時那裏生活的游牧人群，還無緣沐浴印度的思想光輝；而在同時期的歐洲，因為先已有燦爛的希臘羅馬文明，更有新近誕生的基督教，以及在中近東已經存在上千年的猶太宗教，佛教大約祇能止步於彼。儘管如此，在西元後的最初數百年間，佛教也已進入西方人的視野。在馬其頓希

臘帝國的亞歷山大皇帝眼中，佛教祇是東方斑斕而陸離的諸多宗教文化之一。

以歐洲為代指的西方世界對佛教的真正興趣始於近現代。西方人對佛教的留意，開始於他們在東方的殖民經營。西方學術界對佛教的研究，說來也祇有約二百來年的歷史。歐洲經過了工業革命並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以後，歐洲文化也挾商業主義和殖民主義之勢向東方侵入。歐洲的宗教、歐洲的思想文化和歐洲的價值觀念，在數百年當中橫掃東方世界，對那裏固有的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引起了巨大的變化。西方世界對於亞洲佛教的興趣、關注和研究，正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模式自西而東的大趨勢中產生的文化副產品。

本《文庫》的作品遴選，祇是基於中國佛教文化的立場，出於中國佛學的視角。其所關注的是佛教學研究的基本內容，即佛教的經典與教理、宗派與學派、佛教的制度、佛教的實踐，以及它們同佛教所寄身的社會和依存的文化傳統間的內在聯繫。《文庫》力圖包容含攝的，除了近現代中國優秀學者的著作，更多屬意於歐美的和東瀛日本的佛學著作。本《文庫》的涵蓋時間，僅及過去的二百年，自然不能代表佛教在二千五百年來的全部的思想創造與文化積累。但因其側重的是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成果，而驅動這一學術探索活動的，是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科學與理性是西方佛學研究的基本精神，因此，所有的佛學研究成果便具有了與東方世界古來傳統迥然有異的現代精神含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我們編纂這部《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的本意。

對我們中國而言，佛學研究，古已有之。廣義的佛教學或佛學研究，起步於二千年前佛教傳入中國之時。但從那以後，傳統的佛

學研究是服務於宗教解脫目標的，與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有很大的意義差別。傳統中國的佛學研究，最初的對象雖然自外而來，但活動則是一個文化體系內部的自我研究與自我發現，而近現代西方的佛學研究，則多半是來自外部的學術干預。借用後殖民時代的說法，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視角則完全自外而來的、“他者的”眼光和態度，這種研究隔著雙重的距離——文化的距離感、時代的距離感。從常情上說，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研究者不可能不帶著先有的“成見”或“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涉入。按專門研究現代性的社會學家吉登斯的說法，研究者或觀察者在理解時，已經受到“視域”的限制，他們不得不受制於研究對象的文本和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立場。吉登斯稱其為“*double context*”（雙重的視域），也就是來自研究對象和研究者自身兩方面的限制，其研究與考察與佛教傳統背景、與學者的知識結構、文化立場與態度都密切相關。

以往傳統當中的佛教學者，無論僧俗，都是佛教的信仰者，其佛學研究的根本目標指向宗教解脫。其學術活動的起點與終點，都祇能是要想達到“解生脫死”，具有強烈的解脫實踐的特點。西方的佛教學研究，以及從事這項工作的學者，其學術研究活動並不必然聯繫於宗教目標，這首先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所決定的。二百年來的西方佛教學研究，經歷了“宗教學的一民族學的一人類學的”方法論和目的論過程，大致屬於世俗的學術研究。從宏觀方面看，他們借鑒了西方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的方法，而在更加技術性的層面，他們在研究當中，也就坦然地採取了比較語言學的、考古學的、文獻學的手段。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佛教學研究領域內出現的詮釋學研究方法，也大量

借鑒了後現代和後殖民研究的立場、觀點與態度。

就此而言，我們的東鄰日本，其佛教學研究，從明治維新以來，也逐步脫離了以宗教解脫為目的的治學實踐，循著世俗主義的學術路子前進。在保留和繼承佛學研究當中的優秀學術風格與手段（文字訓詁、文獻考訂、史論結合）等的同時，日本佛教學研究也吸收社會學的、政治學的，甚至社會文化批評的方法。就日本佛教學術界言，其所產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纍纍碩果，都產生在十九世紀以降，在日本學者接引了來自西方的，尤其英國和德國的宗教學研究方法之後。

有鑑於以上的原因，我們出版的《現代世界佛學文庫》，致力於搜羅過去二百多年來歐洲與北美的，以及日本的近現代佛教學研究作品。這裏的“近現代”，既有時間上的，也是以理性主義為特質的現代研究方法論意義上的。

佛教學研究是學術性的研究，究其本底而言，與政治目的無關。但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在涉入研究領域時，又不免受到其世界觀與人生觀的價值論立場的影響。因此，學者的發言主張，及其學術結論也不免受到時代政治風氣、學術風氣的影響，在有的情況下，其研究方法也難盡脫政治文化的干預。我們在肯定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化思潮影響下產生的世界佛學研究成果時，另一面也要小心謹慎，言所當言，止所當止。

本《文庫》總結過去二百多年來的佛學成果，大致劃分出以下三個階段的時間框架：

一、十九世紀晚期——二十世紀中期。這一時期，學者們大都致力於用比較語言學的、古文字學的和文獻學的方法來處理佛教的歷史與經典，力求揭示佛教的“本來面目”，力圖展示佛教內在的

“不變的本質”或者“真相”。正是這一時期，形成了三種佛學研究範型：英國—德國學派的，俄國“列寧格勒學派”的，以及法國—比利時學派的。

二、二十世紀中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一時期的佛學研究，可以看作法—比學派的學術風格的繼續發展，其他的兩家已經式微。此期的佛教學研究，在原有的語言學、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上，更多引入了社會科學的多種方法，諸如政治學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技術手段被大量植入，而當詮釋學方法引入這一領域後，西方佛學研究更多地呈現了社會關懷和政治批判，不再祇是純學術的“象牙塔”內的學問。

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佛學研究。繼續發揮前兩個階段的優秀學術特點，而隨著西方世界這一時期逐步展開的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的反省與批判，隨著普世價值觀和文化多元態度的形成，歐美的和日本的佛教學研究也都開始涉及了帶有“後殖民”與“後現代”色彩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批判活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洋”日本的佛教學。它的展開，大致與上述三個時段同步。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佛教學術界，先是借鑒和遵循英德佛學研究的路子，如今則多與北美的佛學研究界聲氣相通。當前日本的佛教學研究，除了配合對日本宗教文化與思維的自省與批判，還有研究的細碎分化傾向，不過這正是社會文化多元發展在佛學研究領域內的反映。

經過兩年的努力，《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第一輯終於問世。我們希望奉獻於文化界和宗教界的這些經典作品，能夠受到社會各界的關心與重視。我們懷著出版人的恭謙與惴惴不安，期待來自社會各界的學術批評和對我們的編纂工作的技術批評。

最後我們非常抱歉地在這裏聲明一句，由於著作權許可的聯繫工作的實際困難，我們這套《文庫》的作品，有的尚未得到原著者或翻譯者的授權。於此，我們懇請諸位大德同我們出版社聯繫，以便我社同權利人辦理相關的授權協議事宜。再次為我們的冒昧致歉，并表達深摯的感恩之情。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貴州大學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十月

本冊簡述

本書原書名爲 *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 – A Study of the Madhyamika System*(《佛教的核心哲學——中觀體系之研究》)。爲求簡明，通常翻譯爲《中觀哲學》。

原書於一九六〇年爲英國 G. Allen and Unwin 公司出版。作者 T. R. V. Murti (默帝) 是印度 Hindu 大學的教授，主授印度文明與文化等課程。爲當代印度大哲羅達克利須南 (S. Radhakrishnan) 的學生。

本書爲作者的成名作。該書爲“英文著作中第一部對中觀哲學的通盤研究。作者通過月稱與俄國的舍爾巴茨基的觀點，對龍樹作了重要而有見地的解析。作者還企圖將龍樹與康德的範疇作對比”。(譯自 *Guide to Buddhist Religion* 第 60 頁，作者 F. E. Reynolds)

譯者郭忠生先生，畢業於中國臺灣中興大學法律系，爲譯英爲漢的業餘佛典翻譯家。除了本書外，另譯有《原始佛教》等書行世。

原序

已故徹爾巴斯基教授 (Professor Stcherbatsky) 曾於公元一九二七年叙及：

“雖歐洲明始以科學方法研究佛教已歷百餘年，然吾人對其宗教暨哲學之基本教義却仍所知無幾，猶如在黑暗中摸索。的確，從未有其他宗教如此難以釐清其理路。”

——見氏所著《佛教涅槃觀》第 1 頁

時至今日，徹爾巴教授此言仍屬正確。再者，前揭所引文亦為吾人認定佛教研究所遭遇之難題之標竿。佛教之深廣確是出人意表，汗牛充棟、雜然並陳之文獻，包括經典、註釋暨系統化著作，其涵蓋之時期達十五世紀之久，而此等文獻又散見於梵語、巴利語、藏語、漢語及蒙古語族諸語文字中。尤有進者，其複雜性亦是盤根錯節；其宗派之確實數目至今難以確認，而該等學派之思想又錯綜複雜。佛教之解釋缺乏一貫認之準繩，足以補正吾人理解之不當之處暨缺陷，乃是吾人所遭遇最大之難題。然縱使有前開所述之困難，吾人仍須發堅定之願心以瞭解佛教。若欲正確而有效地瞭解印度哲學暨宗教，此為不可或缺之要件，而佛教正是對印度哲學暨宗教有著深遠而永恒的影響。再者，佛教乃是南亞、東亞暨遠東

國家等地區之重要文化，從而佛教之研究亦必對世界文化有相當之貢獻，且對今日世界亦不無深遠之意義。

中觀學派於佛教中激起思想革命，并由之而及於印度哲學整體，此一系統實值吾人投以相當的注意。整個佛教思想轉而成爲中觀學派之“空義”。早期佛教之多元論傾向，暨其否認實體及提出未具批判心識之“成素理論”(theory of elements, 即諸蘊和合)，顯係龍樹自我覺醒及徹底之辯證之前奏。瑜伽唯識宗之觀念顯然承襲了中觀學派之“空”，而賦予觀念論之含意，婆羅門教思想之批判暨絕對主義思潮亦可溯其源於中觀學派。

論及中觀思想之地位暨重要性，筆者大膽地讚之爲“佛教根本哲學”。有關此一論題之現代著作爲數不多，且亦不無誤解之處。吾人所見之印度哲學教科書均自滿於渠等對此一系統所爲之簡陋敷衍之處理。某些評論家暨思想史學者傾向於將中觀學派貶爲虛無主義，有許多學者甚至將之視同吠檀多學派(Vedānta)。此等批判之誤解中觀思想可謂如出一轍。徹爾巴斯基之佳著《佛教涅槃觀》(*The Conception of Buddhist Nirāna*)係屬此中之例外，唯該書本文僅六十餘頁，其中大部分係在處理有關涅槃概念之論辯暨詮釋，吾人實無法期望該書能對中觀哲學有完整之解釋。本書之作即希望補足吾人此方面認知之缺憾，本書對中觀哲學之重要層面均有完整之研究。

本書共分爲三部分，各部分雖各有其處理之重點，唯却相互連貫，然其篇幅長短不一。第一部分主要是歷史的：討論中觀哲學及其辯證法之起源暨發展，按中觀辯證法之目的在於嘗試消解印度哲學兩大傳統——有我論(ātmavāda, 實在之實體見)及無我論(anātmavāda, 實在之形式見)所引發之衝突。而辯證法之預

設可見諸於著名之佛陀之“沉默”——其拒絕思辨及預測超驗實在 (transcendent reality) 之諸種經驗性範疇。中觀學派發展之階段，其宗派之思想暨文獻均以相當之篇幅析論之。再者，中觀思想對後代哲學，特別是唯識宗及吠檀多學派可能之影響亦并予叙及。第二部分，也是本書的主要部分，則對中觀哲學提出一完整而具批判性之詮釋，此包括其辯證法之結構及其於思維範疇之辯證性運用，并論及中觀學派對“絕對”、宗教暨倫理學之概念。而“中觀辯證法之運用”一章（第七章）則主要是歷史性之探討，且有相當程度之技術性。讀者於初次閱讀時，或可略去不讀。本書最後一部分則將中觀學派與某些著名之西方辯證系統（康德、黑格爾及柏烈得萊）相比較，并對不同之絕對主義（唯識宗、中觀及吠檀多）作了簡短之研究。渠等間之差异，迄未能為一般所瞭解。

以比較方式進行研究時，有某種程度之危險。從未有兩種思想系統，甚至屬於各該系統之某觀點是同一或極為相似。唯自另一方面觀之，若渠等係截然相異，則吾人即無法予以區分甚或瞭解之。筆者一直努力勾出中觀、唯識宗暨吠檀多三者於每一重要論題之差异。再者，筆者亦嘗試以西方所見之類似思潮之發展來瞭解印度哲學之發展，特別是筆者以康德作為詮釋中觀哲學之指標，而西方哲學暨印度哲學之間於外觀及背景方面之差异，筆者亦小心翼翼以免有所混淆。不論比較之方法有何缺點，此等以西方人所熟知之哲學概念來詮釋印度哲學或許是使西方人瞭解之唯一方法。

很幸運的是，吾人不僅能運用中觀思想之基本論典，而且能利用所有重要之原典，不論是就梵語原典，或是各種譯本或其還原本。然而西藏語資料對吾人確大有助益，特別是在佛護 (Buddhapālita) 與清辨 (Bhāvaviveka) 方面之資料為然。然而

僅靠梵語資料亦不是重大之瑕疪，蓋自龍樹創始中觀學派以至公元十一世紀時般若迦羅摩禰（般若行慧，*Prajñākaramati*）之《入菩提行論細疏》（*Bodhicaryāvatāra Pañjika*），吾人均得以讀到中觀思想每一發展階段之代表性梵語資料（按自公元十一世紀以降，佛教實際上已自印度本土消失）。尤有進者，中觀思想一切均以辯證為依歸而沒有提出自身之理論，從而此等吾人可自其他文獻搜集而得之資料，對於中觀哲學之重要解釋，并無何等重大影響。

筆者並非採取語言學家之方法，亦不在研究古董，而是在求能重建并重新把握到中觀哲學之精神。哲學之歷史并非一座陳列過時事物之博物館，而是要鮮活地闡釋哲學之理念；本質上是一賦予新的價值，重予解釋。當然，對筆者有所批評之人或許與筆者對中觀思想之解釋并不一定完全符合，甚且在許多印度思想之觀點亦然。於哲學中，不同的解釋應是正當的，甚至應為人所歡迎。如果筆者於本書所提出之看法，能對瞭解印度哲學中之此一重要層面有些許幫助，則筆者即感心滿意足矣。

（按本書為原著者之博士論文，以下為對師長學友之感謝詞，此處從略。）

穆 帝